



Mianju zhihou

面具之后

南帆

南
帆

面具之后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具之后/南帆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11

ISBN 978-7-108-03507-3

I. ①面… II. ①南…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
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7689 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 数 166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对话姿态 1

个人姿态与对话 1

自由与享用 5

札记：知识与人格 9

作家，还是公民？ 20

思想的襁褓 25

人文精神：反抗的功能 29

我们的创造力哪里去了？ 33

大师和我们 37

颠倒的宽容 40

第二辑 文学刻度 46

文学史的刻度与坐标 46

80年代：多义的启蒙 56

《冲突的文学》后记	66
分裂不可弥合——读《万物花开》	67
“本土”的歧义	76
传统与本土经验	83
快与慢，轻与重——读铁凝的《笨花》	95
笑声与阴影里的情节	104
地域与文学的音阶	113

第三辑 面具与幻象 117

面具之后	117
奇怪的逆反	123
电影与明星崇拜	129
包装的神话	131
《文明七巧板》后记	139
休闲的历史	141
历史与中国元素	145
《还珠格格》：快乐的幻象	152
反抗与白日梦	154

第四辑 时尚、神话与大众 158

泡沫文化	158
时尚与文学的趣味	164

论口号 172

神话的解析 178

文明的悖论 186

底层与大众文化 196

女性文学的明天 202

女性的反抗声音——读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 204

第五辑 各个角度 212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前言 212

大概念迷信 215

论文与专著 223

低调的乐观 227

批评的能力 230

文化动力、人文学科、解释体系 239

好作家，或者重要作家 246

拒绝投机 249

第六辑 理论症候 254

《文学理论新读本》后记 254

《文学理论》后记 256

理论的阅读障碍 258

诠释与历史语境 260

序《判断的历险》 268

《关系与结构》后记 271

研究方法、过度阐释与二元对立 273

文体的震撼 282

分类与自由 289

后记 296

第一辑 对话姿态

个人姿态与对话

“过把瘾就死”的调侃已经从洋洋洒洒到了强弩之末。种种迹象表明，严肃开始重返文学。张承志、张炜、韩少功这样的作家应声而出，慷慨疾呼，不惜将自己的观点和形象暴露在世俗的惊愕目光之下。另一方面，一批人文学者正在反省何谓“知识分子”，“人文精神”这个话题下面汇拢了一系列重要的阐述：诸如知识分子的精神，信念，人格，责任，地位，功能，价值体系，理想情怀，如此等等。眼下，形形色色的欲望正在召集一个庞大而又混乱的化装舞会。这样的时刻，这批知识分子的严肃立场不由得令人一振。

不言而喻，这样的立场可能遭受抵制和怀疑。蔑视欲望的人将被快乐的尘世所抛弃，这没有什么可奇怪。怎么能在麻将桌上谈论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呢？然而，不可忽视的

是，这一切同样让另一批知识分子感到了不安。后者已经从精神上提前跃入“后现代”，“后新时期”乃是他们为“中国式后现代”给出的一个得意的命名。他们眼里，“后新时期”是一个商业和欲望所制造的狂欢时代。此刻的知识分子企图扮演大众的启蒙领袖，这无疑是堂吉诃德式的谵妄。知识分子的羸弱形象丧失了号召力，同时，理想已经成为一个可疑的字眼儿。理想曾经煽动一代人的狂热激情，而这一切终于在一场空前的骗局之中焚成灰烬。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于“理想”小心翼翼的警觉恰好与当代的知识背景不谋而合。经过尼采、德里达和福柯们的瓦解和破坏，还有哪一块神圣的“理想”高地未曾陷落呢？他们的理论锋芒之下，许多震慑人心的理想口号无不遭到了釜底抽薪的威胁。此外，谈论这些话题的激烈声调还可能勾出某种不祥的记忆。于是，王蒙以过来人的身份提出告诫：警觉极端所造成的排他主义，“信念”的情绪伴随物可能导向文化专制主义。

显然，这不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创造和维护民主的文化局面。换一句话说，这批知识分子不仅需要表述自己，而且需要倾听他人；发言的同时，他们还有必要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范围和他人所享有的权利。

在我看来，首先应当具有这样的共识：这批知识分子的观点仅仅意味着一种个人的姿态，而不是一种普遍的规范。无论是英雄主义的气概，还是哲合忍耶的坚忍，这批知识分

子有权利以个人的名义宣谕主张，抨击庸俗，斥责市侩，自由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在另一些人眼里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在另一方面，这批知识分子必须料想到，其他人同样保留着接受或拒绝上述观点的自由。换言之，这批知识分子可以激烈地表白自己，同时，他们又将以同样的激烈保卫他人给予反驳的权利。这是避免独断和专制的基本条件。

的确，“理想”的标准答案已经废弃，理想变成了一个探索的目标，而不是既定的指引。张承志、张炜或者韩少功亮出的旗帜并不一致。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立场构思理想。一个虔诚的教徒无法将股票商引为同志，可是，他们之间的信仰自由不该遭受强制性的互相干预。福柯曾经揭示，知识的背后还隐含了权力。因此，知识分子应当避免的是，知识权力的过分扩张以至于封杀另一些异己的声音，使之沉入匿名的黑暗。所以，知识分子可以纵论他们所景仰的“人文精神”，但这不该妨碍他们的视域向世俗开放。知识分子应当尊重世俗的存在，将世俗作为一个合格的辩论对手。不论两者之间可能出现多大的歧义，知识分子将像维护自己的自由一样维护对手的自由，甚至在对手懵然无知的时候提示他们所享有的合法权利。

这同时决定了“启蒙”所展开的维面。这批知识分子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干涉公众的选择，甚至夺过公众手里的罗

盘，居高临下地指定一条唯一的路线。知识分子经常做的仅仅是，告知公众种种可能的参照，让公众尽可能避免盲目的选择。不少场合，公众可能为时髦、舆论和广告所蛊惑，无形地遵从某些匿名权威的诱导，丝毫察觉不到这种诱导所隐含的胁迫和控制。这时，知识分子有义务揭破这一点，清理一系列人为的遮蔽，描述种种可能的维度，让公众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做出全面判断。公众在判断之前得不到充足的参考资料，这是知识分子的失职。公众掌握了这些参考资料之后，知识分子没有必然的理由强求他们服从自己的选择。当然，除了这一项工作，某些知识分子还可能乐意进一步卷入具体的社会事务。他们试图超出描述的范围而获取领袖的风范。这样，知识权力必须同其他势力——诸如政治权力、道德威信、经济优势、社会地位——结合起来，谋求主宰社会的条件。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特殊威望就会如同双刃之剑：他们可能作为精神首领发出正义的召唤，也可能因为滥用权力而产生文化伪装之下的专制。

至少在目前，这批作家和学者已经构成一场新的冲击。除了个人观点，这场冲击还迫使知识分子设身处地地考虑一系列关系：例如个性与宽容，信仰与自由，欣赏与摹仿，写作与行动，激情与分析，如此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考虑远比初级的喝彩重要。这些关系是知识分子重新定位的重要依据，同时是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之间如何对话的基础。

自由与享用

如今的文学的确有了些小康的迹象。持续已久的内在紧张逐渐消失了。文学不再显得峻急激烈，一种松弛或者涣散正在悄悄弥漫。诗的铿锵音节湮没在流行歌词后面，“此致那个敬礼”充当了大江南北的共同抒情；艳情在历史事件的包装之下成为小说的抢手主题，明智的小说作家将批评家或者文学史弃置不顾，他们更乐于依靠记者和小报搅动舆论，然后在大大小小的影视导演面前待价而沽。众多报纸的周末版为散文、随笔的表演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无数的感觉碎片和思想碎片形成一片斑斑驳驳的文字景观。还有哪些宏大的话题能够聚集众多作家的目光呢？干预生活，主体，科学主义方法，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这些辉煌一时的口号、概念均已是昔日陈迹。尽管“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之类仍在竭力摇旗呐喊，可是局面已非，应者寥寥。另一方面，“先锋”、“圣战”、“终极关怀”这些字眼儿偶尔还在刊物之间闪烁，但它们的内涵并未得到规模相应的阐发。每一批甚至每一个作家都在自行其是的时候，人们还能从文学之中抓住什么重要的问题呢？

也许，人们要说，自行其是即已意味深长——这意味了目前文学所享有的自由。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文学的诸多方

面都套上紧箍咒——从素材的选择到故事的编码。这曾经使许多作品风格单调，如同穿上了制服的集团军士兵。相对地说，作家的自行其是表明了解禁之后的宽敞。没有人还能颁布文学指令，强制规定新的文学单行道。无论是波黑战局、已故领袖还是异乡恋情或者晚餐菜肴，作家手中的那一管笔拥有了空前的活动半径。自不待言，这样的自由必须珍重和维护。人们再三情辞恳切地吁请文学的自由，那么，这至少是一个令人安慰的局面。

可是，对于作家说来，自由应当如何享用呢？自由不是解释为重力丧失，从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自由毋宁说是，作家有权利选择自己所认同的参照坐标，从而做出自己的基本判断。也许，自由首先要让作家意识到，一个事件的定位不仅依据唯一的坐标体系。众多坐标体系将导致不同的描述和结论。一个失业工人自杀了——这样的故事可以输入不同的坐标体系，显出迥不相同的层面。企业管理人员，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公司董事长或者死者亲属对于这个故事的思想相距甚远。一个作家如何确认他的参照坐标？这是自由对于作家的基本考验。

没有一个作家有理由推托说，他们拒绝任何参照坐标，并且以自由作为拒绝的借口。现代社会不存在文化真空。不少作家自称不屑于理论；事实上，他们往往接受了最为粗浅或者最为常见的理论。没有能力选择参照坐标，无异于没有

能力享用自由。

这样，自由所具有的宽容仅仅形容了诸种文学主张之间的相处和关系；对于个别作家说来，自由同时具有相当严峻的一面。自由意味着撤除栅栏，无须伪饰；作家完整地交出自己，任何推托之词都丧失了理由。作家的主张和立场无不说明自己的意愿，没有胁迫，也没有谎言。彻底地亮出自己的旗帜，并且在一个敞亮之处完全地为自己的主张负责。这时，自由将使一个作家的精神质量充分暴露，他们甚至无法将专制的阴影作为藏身的借口。远离了上帝的约束，凡人必须有勇气用双肩承担一切。人们眼前的众多作家，又有几人做好了进入自由的热身准备？

一批作家决定用潇洒作为接受自由的策略。潇洒也就是无所羁绊，不为情所累，不为义所累，不为道所累，不为思想所累。在他们那里，自由即是轻松和快乐，他们未曾感到生命之轻的痛苦。没有不屈的坚持，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批驳，自由骤然使他们显得无足轻重和毫无个性。从另一方面看来，潇洒成了精神慵懒的同义语。是的，小康十分易于成为慵懒的催化剂。

相反，另一些作家正是在相对自由的背景之中体现出令人敬重的品质。自由恰如其分地成了他们的思想时机，他们的才智、襟怀和精神守则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机会展现。韩少功的一批随笔表明，新的环境为他的思想带来了一个新的

潮汐。现代性，人的质量，生命意义这些重大问题被置于一个宏大的文化帷幕下面，活跃视野和纵横的议论显然是自由思想的结果。相似的意义上，张承志或者张炜同样引人瞩目。诚然，并不是人人都信服张承志的哲合忍耶，奔赴北部的黄土高原；或者跟随张炜的思想，向喧闹的城市掷出愤怒的呵斥。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严肃姿态具有不同凡响的分量。这种严肃姿态不啻是对自由的回报。真正的思想和个性才是自由的果实。不言而喻，提到三位作家的名字绝不是期望这样的后果：不久之后，众多仿张承志、伪张炜或者小号韩少功开始流行。可以重复地说，重要的是每一个作家的精神质量。事实上，从先锋作家的叙事实验、写实作家的透彻视线到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洞察，所有的方面都潜藏了有待于填充的空白，等候相宜的人选。真正的作家应该有勇气从这样的高度审视自己的作品：如果撤除所有的外部障碍，这样的作品已经证明了我的所有深度了吗？表面上，这是作家的自我掂量，在我看来，这同时是自由向一个作家的提问。

当然，所有的自由都仅仅是相对的，文学自由亦然。作家同样是一个社会成员，他不可能逃离特定社会的种种基本规定。幻觉已经击破，作家并没有一个俯视众生的特殊位置。作家对于社会供给系统的依赖决定了他局内人的身份。他们并没有一个局外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生存空间。因此，许多作家同样没有能力完全挣脱市场之手的操纵。并没有多

少作家继续耻于言利。市场、稿酬、传播媒介、广告、通俗文学之间的连锁关系无可厚非。如同任何社会成员一样，作家有权利企求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获取一个公道的价格。尽管如此，作家仍然要警觉的是，利润可能在某些时刻干预作家的精神自由，或明显或隐蔽地迫使作家向某种俗趣就范。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拒绝利诱所需要的勇气并不亚于拒绝权势，尤其是在今天。在这个意义上还应该指出，作家至少必须在精神上穿透金钱的制约。无论是否拥有公平的待遇，作家都要自视为一个精神探索者，一个时代的见证人，一个人性的卫士，一个公众的代言人——这毋宁说是作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札记：知识与人格

近期的报刊阅读之中，我见到了许多谈论知识分子人格的文章。显而易见，知识圈对于这个问题产生了持续的兴趣。不少人的心目中，人格的质量似乎意味了知识分子的质量。于是，从顾准、陈寅恪到海德格尔、周作人，人们相继遇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楷模。这些文章的不断增添让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同感，宽慰，慨叹——同时还有一些模糊的不安。

这样，我开始清理不安的产生原因。

我首先意识到，人格问题并非知识阶层的独有问题。在我看来，知识是知识阶层的标志，如同股份是股东的标志或者官衔是官员的标志一样。换一句话说，知识阶层不是一个拥有特殊人格的道德团体——这个方面，知识阶层甚至远不如宗教团体突出。的确，知识分子之间曾经出现刺眼的人格缺陷：专制、变节、附逆、怯懦、知识盗窃甚至凶恶残暴不时可见。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知识阶层的人格缺陷远远超出其他阶层的平均水平。这不是企图为知识阶层开脱；这意味的是，人们必须从全体社会成员——而不仅是知识阶层——的意义上考察这些人格缺陷的原因。

如果仅仅将考察拘囿于知识阶层，无形之中可能产生两种理论后果：

(1) 人们仿佛认为，完美的人格是知识阶层的独特徽记；众多社会成员之间，知识阶层是人格的表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幻觉。事实上，知识阶层向社会承诺的是知识，而不是他们的人格示范；知识阶层屡遭迫害的原因同样是知识，而不是他们处世的气节。

(2) 如前所言，知识阶层的人格缺陷是与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格缺陷联系在一起的。撇下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状况单独呼吁知识阶层的自我完善，这样的拯救无济于事。如果没有考虑到文化环境的构成而仅仅谈论知识阶层的道德修养，人们很可能对于问题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